

# 埃及现代政党政治的演变

哈 全 安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埃及现代政党政治缘起于20世纪初,历经宪政时代、纳赛尔时代和后纳赛尔时代三个阶段。从宪政时代的多党政治到纳赛尔时代的一党政治和后纳赛尔时代政党政治的多元化进程,构成埃及现代政党政治演变的明显轨迹。民族主义政党与民主主义政党的此消彼长、世俗政党与宗教政党的错综交织、议会政党与非议会政党的激烈角逐,集中体现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历史运动。

**关键词:**埃及;政党政治;华夫托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穆斯林兄弟会

**中图分类号:**K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7)04-0133-08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政治的日臻成熟则是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标志性内容。埃及的政党政治发端于20世纪初,历经宪政时代、纳赛尔时代和后纳赛尔时代,集中体现新旧经济秩序的此消彼长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激烈抗争。本文拟结合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分析埃及现代政党政治的演变历程,进而考察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域的深刻历史变革。

埃及现代政党政治缘起于20世纪初的特定历史环境。西方的冲击导致埃及传统经济秩序的逐渐衰落,传统模式的政治制度摇摇欲坠。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传入埃及,自由与民主成为埃及民众追逐的时尚。伴随着经济社会秩序的变动与智力的觉醒,现代政党在埃及始露端倪。自1907年起,祖国党、民族党和立宪改革党相继组建,首开埃及现代政党政治的先河。崇尚主权在民和宪法至上的西方现代政治理念、强调超越宗教界限的民族意识与国家利益、倡导保障民众权利和实行宪政制度,构成祖国党、民族党和立宪改革党的共同政治纲领。

1923-1952年是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宪政时代,宪政制度的历史实践成为此间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宪法的制定和议会的建立无疑是宪政制度的重要外在形式,诸多政党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角逐国家的统治权力则是宪政制度的明显特征。始建于1918年的华夫托党可谓宪政时代议会政党的原型,宪政时代的其他诸多议会政党大都脱胎于华夫托党。华夫托党亦是宪政时代最重要的议会政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共计举行8次议会选举,华夫托党6次获胜<sup>[1](p.295)]</sup>。宪政时代的埃及名为主权国家,却在诸多方面从属于英国殖民当局,缺乏必要的独立地位。英国的殖民统治导致日趋尖锐的民族矛盾,由此形成埃及宪政时代政党政治之民族主义的明显倾向,

收稿日期:2006-12-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01JA770041)

作者简介:哈全安(1961—),男,吉林吉林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东史研究。

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实现埃及的政治独立成为诸多议会政党的共同政治立场。华夫托党作为宪政时代最重要的议会政党,长期致力于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倡导埃及民众的广泛政治联合,主张通过合法的与非暴力的斗争方式结束英国对于埃及的殖民统治。纳哈斯领导的华夫托党政府经过艰苦的谈判,于1936年与英国殖民当局签署协议,迫使英国殖民当局放弃其在埃及的诸项特权[2](p.39)。

宪政时代的埃及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阶段,传统农业依然是基本的经济部门,封建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农民普遍表现为固着于土地和依附于地主的社会状态。地主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把持议会和内阁,是宪政时代最具实力的社会群体。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往往兼有在外地主的双重身份,进而形成与传统秩序的密切联系。诸多议会政党建立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之上,具有精英政治的浓厚色彩。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深刻对立,决定了诸多议会政党之排斥下层民众政治参与的保守倾向。宪政时代最具政治影响的华夫托党尽管在争取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表现出不与英国殖民当局妥协的明确态度,却因特定的社会基础而无意推动下层民众的政治崛起和扩大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无力弥合埃及国内日渐加深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在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持相对保守的立场,尤其是在土地改革方面举步不前,进而逐渐丧失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

宪政时代前期,世俗民族主义无疑是埃及政坛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世俗色彩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与精英政治呈三位一体的状态。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埃及民众的价值取向逐渐由崇尚西方的世俗政治理念转变为回归传统的宗教政治理念。与此同时,民众政治悄然崛起,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影响迅速扩大。穆斯林兄弟会的总训导师哈桑·班纳声称,穆斯林兄弟会并非政党,而是代表埃及民族的精神和灵魂。然而,穆斯林兄弟会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包含现代政党的诸多要素。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目标,一是复兴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二是建立教俗合一的国家秩序,三是致力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实现埃及的主权独立,四是保障民众的权利和实现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信仰兴则民族兴”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纲领,具有民族主义的明显倾向。与宪政时代的诸多世俗议会政党相比,穆斯林兄弟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借助宗教政治的外在形式,强调神权政治性、民众参与性和圣战暴力性,旨在以民众政治取代精英政治。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实践无疑超越宪政制度的议会框架,浓厚的宗教色彩、诉诸神权的政治倾向、激进的斗争方式和下层民众的广泛社会基础构成穆斯林兄弟会作为非议会政党之区别于宪政时代诸多议会政党的显著特征。进入4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成为埃及最具影响力的民间宗教政治组织和非议会政党,拥有2000个分支机构和50万成员[2](p.123)。由穆斯林兄弟会发起和组织的民众示威和其它政治运动,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发行的报刊和出版的书籍,在当时的埃及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从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此消彼长到议会政党与非议会政党的激烈抗争,集中体现埃及社会之精英政治与民众政治的深刻对立。穆斯林兄弟会的滥觞,构成宪政时代后期下层民众政治参与的外在形式。

1952年7月,自由军官发动政变,废黜法鲁克国王,是为著名的“七月革命”。埃及由此进入纳赛尔统治的时代,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的三位一体构成纳赛尔时代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模式。纳赛尔政权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致力于捍卫埃及的国家主权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1956年英军撤离塞得港和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标志着埃及殖民主义时代的终结和民族革命的最后胜利,纳赛尔俨然成为埃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象征。与此同时,纳赛尔政权推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强调政府的经济干预和民族工业的优先发展。“纳赛尔政权名曰社会主义,实为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剥削和统治,是纳

赛尔政权的社会基础”[3](p.167)。1962年颁布的《国民宪章》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只有国家资本主义被允许存在”成为纳赛尔政权的经济准则,金融业和主要工业部门的国家所有、进出口贸易的政府控制以及私人工业的公共监督构成纳赛尔时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1](p.397)。纳赛尔政权曾经于1956年和1964年两次颁布临时宪法,而两部临时宪法的共同特征在于总统制形式下的极权政治。纳赛尔作为总统,高居国家权力的顶点,凌驾于社会之上,是埃及民众心目中“仁慈的君主”。纳赛尔的“统治地位源于其奇里斯玛式的独裁和恺撒式的专制。纳赛尔总统成为埃及新的政治秩序的中枢,控制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1](p.425)。议会名为最高立法机构,却缺乏独立的政治地位,依附于总统,其决议只是一纸空文。“内阁成员仅仅充当听众的角色,只有纳赛尔是发言人”[4](p.103)。纳赛尔时代,自由军官作为埃及政治舞台的核心群体,控制国家政权和国有经济,逐渐转化为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民众的政治参与微乎其微,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渠道,政治体制与诸多社会群体的政治需求严重脱节,国家与社会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政治生活的社会基础颇显脆弱。

“七月革命”之后,纳赛尔政权取缔包括华夫托党在内的原有议会政党,解散穆斯林兄弟会。与此同时,纳赛尔政权成立解放大会,作为动员民众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工具。如同哈桑·班纳声称穆斯林兄弟会并非政党一样,纳赛尔声称解放大会亦非政党,而是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组织机构。解放大会的基本纲领是:促使英军撤离尼罗河领域,实行苏丹的民族自决,开发国内资源,鼓励私人投资,发展本国工业,建立平等的社会秩序、公平的经济秩序[4](pp.87~88)。解放大会的宗旨,在于寻求各界民众的广泛支持,弥合国内的差异和对立,强调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政治目标,共同建设新埃及。解放大会设有中央最高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地方设各级办事机构。解放大会最初由纳吉布任主席,纳赛尔任副主席和总书记;1954年起,由纳赛尔任主席和总书记。1955年,解放大会成员达到55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5](p.157)。

1956年,纳赛尔政权解散解放大会,成立民族联盟,纳赛尔任民族联盟主席。民族联盟设有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遍布各地的基层委员会,行使法律建议权和政府监督权。根据1956年临时宪法,全体公民被视作民族联盟的后备成员,议会的议员须由民族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名。纳赛尔声称:“民族联盟是埃及全体人民的联盟和民族阵线,包括埃及人民的所有成员,只有反动派、机会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除外。”[6](p.54)

1962年,民族联盟解散,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取而代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与民族联盟名称各异,却无本质区别。根据纳赛尔政权颁布的《民族宪章》,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包括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五种成分,基本目标是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即劳动人民的革命。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是社会主义先锋队,是人民的政治组织和最高权力机构,以人民的名义领导国家和监督政府。《民族宪章》明确规定,包括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劳动人民以及其它不剥削阶层构成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政治基础,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的对象以及相关的社会群体则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所排斥的目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负责决定议会人选和审定议会议程,议会和内阁政府负责执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制定的基本政策[7](pp.222~224)。纳赛尔标榜农民和工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主人,必须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以及一切选举产生的政治机构中占半数以上的席位,而所谓的工人指年薪不超过500英镑的城市劳动者,农民则指占地不超过25费丹者的乡村劳动者。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中央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地方设省市县三级委员会,纳赛尔担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64年的议会选举将全国划分为175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两人,当选者必须是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成员,其中一人必须来自工人或农民。1968年,阿拉伯社

会主义联盟的成员达到500万人[4](p.91)。

尽管纳赛尔一再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党制度,声称“一党制不适合我们,因为它意味着政治垄断;多党制也不适合我们,因为它是当今外国势力渗入我国的一种手段,借以破坏我们奠定的用来动员人民的基础”[5](p.156),然而政党制度在纳赛尔时代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纳赛尔政权所反对的,只是传统的政治秩序以及宪政时代与传统社会势力密切相关的诸多政党。所谓的解放大会、民族联盟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皆有鲜明的立场、明确的纲领、严密的组织和完整的机构,具备政党的基本要素。纳赛尔时代,埃及政党政治的突出特征在于长期实行一党制。解放大会、民族联盟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相继作为唯一合法的政党,处于纳赛尔政权的操纵之下,服务于纳赛尔政权排斥异己、驾驭社会和控制民众的政治需要,是纳赛尔时代极权政治的御用工具。纳赛尔时代,政党基层组织遍布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政党最高机构包括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政治核心则是以纳赛尔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纳赛尔作为总统的绝对权力和自上而下的政治原则,构成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工会和诸多职业协会以及遍布乡村的合作社组织,构成自上而下的政党政治在民间社会的逻辑延伸。另一方面,解放大会、民族联盟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核心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缺乏明确的界限,自由军官往往身兼政府与政党的双重职务,纳赛尔集国家元首与政党领袖于一身,政党机构兼有政府职能,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体,而加入解放大会、民族联盟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则是步入仕途的前提条件。

1970年纳赛尔死后,埃及政坛出现严重的分歧和对立。萨达特总统于1971年宣布发动“**3**继1952年“七月革命”的第二次革命即纠偏运动,进而推行新政举措。萨达特发动“纠偏运动”的直接原因无疑是萨达特集团与纳赛尔主义者之间的权力角逐,所谓的新政举措表现为非纳赛尔化的明显倾向,而政党制度的改革构成萨达特时代新政举措的重要内容。

1971年5月,萨达特宣布“保护民众自由”和“扩大民众参政范围”,改组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1974年4月,萨达特颁布《十月文件》,在沿袭纳赛尔时代的传统和强调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作为唯一合法的民众性政治组织的同时,承认纳赛尔时代缺乏民众的政治自由,主张兼重社会自由与政治自由,取消新闻监督,允许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政治框架内发表不同的意见。同年8月,萨达特制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发展方案》,在重申坚持一党制和反对多党制的同时,明确规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不再行使国家权力,只是表达民意的政治组织,进而建议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向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广泛开放,允许包括土地改革和国有化对象在内的所谓剥削阶级加入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旨在淡化一党制。同年9月,萨达特公开指责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内部机制缺乏政治民主,主张政府政治脱离政党政治和恢复多党制的政党制度。然而,萨达特的意见并未得到议会多数成员的支持,却被淹没于纳赛尔主义者的反对声音之中。1975年5月议会选举前夕,约400万人登记加入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表明纳赛尔主义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4](p.113)。

1976年1月,萨达特重新发起关于一党制与多党制的讨论。1976年3月,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出现论坛形式的三大政治派别,其中阿拉伯社会主义组织持中间立场,拥护萨达特实行的内外政策,自由社会主义组织持右翼立场,强调实行进一步的自由化政策,民族进步联盟组织持左翼立场,主张沿袭纳赛尔主义的传统。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裂变,构成萨达特时代多党化进程的起点。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的划分,则是萨达特时代多党政治的雏形。1976年11月,萨达特正式开始“进行崭新的民主试验”,宣布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三个论坛已经具有政党的职能,享有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应当成为独立的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内部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组织、自由社会主义组织和民族进步联盟组织随之分别更名为阿拉

伯社会主义党、自由社会主义党和民族进步联盟党。原有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保留中央委员会,负责监督政党活动和控制政党的财政收支,其他机构和组织予以解散[8](p.165)。1978年7月,萨达特提出新的政治改革方案,决定终止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存在,确立完全的多党民主制。与此同时,萨达特宣布成立民族民主党,自任民族民主党主席。随后,执政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宣布并入民族民主党,右翼的自由社会主义党亦宣布与民族民主党合并。

萨达特时代的政党,既可分为左、中、右三种倾向,亦可分为执政党、官方反对党和民间反对党三种类型。纳赛尔时代,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作为唯一合法的政党,其核心成员主要来自自由军官及左翼知识分子。萨达特时代,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和民族民主党相继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其核心成员既有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亦包括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和私人企业的投资者。执政党核心成员构成的差异,标志着萨达特政权社会基础的深刻变化。另一方面,纳赛尔时代,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体,政党纲领与政府实施的具体政策高度吻合。相比之下,萨达特时代后期,由于多党制的政治环境,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开始出现分离的迹象,即使作为执政党的民族民主党,其政治纲领亦与政府实施的具体政策不尽相同,可谓貌合神离。尽管如此,萨达特时代沿袭纳赛尔时代的政治传统,作为执政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和民族民主党始终维持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政党内部缺乏必要的政治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党与民族进步联盟党皆脱胎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分别构成右翼官方反对党和左翼官方反对党,与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党及民族民主党长期处于合作状态,具有温和的政治倾向。1977年食品骚乱以后,民族进步联盟党逐渐与执政党分道扬镳,进而由“官方的反对党”演变为民间的反对派政党。1978年秋,萨达特授意组建社会劳动党,取代民族进步联盟党作为官方操纵的左翼政党,时人称之为“政府主办的反对党”[5](pp.399~340)。新华夫托党系宪政时代华夫托党的政治延伸,持右翼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宪政时代,华夫托党的政治纲领是争取埃及的民族解放,具有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萨达特时代后期,新华夫托党的政治纲领是推动埃及的非纳赛尔化即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民主主义的明显倾向。新华夫托党是萨达特时代后期最重要的民间反对派政党,代表中上层的民间政治势力亦或新兴的私人资产阶级,其核心成员来自非官方的商人、工厂主和地主[9](pp.209~216)。1978年3月,申请加入新华夫托党者接近百万,人数远远超过自由社会主义党和民族进步联盟党而仅次于执政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党[5](p.396)。新华夫托党诞生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政治框架之外,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区别于阿拉伯社会主义党、自由社会主义党和民族进步联盟党。新华夫托党的建立,表明萨达特时代私人经济的复兴和自由资产阶级角逐政坛的初步倾向。随着新华夫托党的建立,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明显的变化,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升级。

政党政治具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物质利益和政治要求,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着政党政治的模式和走向。纳赛尔时代,一党制的政党模式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和官僚资产阶级垄断国家权力的基础之上。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处于从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的过渡阶段,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状态,国家资本主义趋于衰落而尚未退出历史舞台,自由资本主义日渐发展而尚未确立主导地位,官僚资产阶级势力犹存,新经济政策和非国有化运动所催生的新兴社会阶层亦欲分享国家权力,政治力量处于重新组合的状态,政治生活呈多元化倾向。萨达特时代埃及政党政治的变化,根源于所有制的深刻变革,集中体现不同社会阶层的尖锐对立和诸多政治集团之间的激烈角逐。随着一党制的衰落和多党制的初步实践,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开始成为不同的社会群体角逐权力的政治形式,埃及的政治生活逐渐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和民主化的端倪。

萨达特时代后期的多党制政党政治在诸多方面与宪政时代的多党制政党政治颇具相似之处,形式上表现为历史的重复。然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和新旧社会势力的剧烈消长,标志着从宪政时代到萨达特时代埃及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因此,宪政时代与萨达特时代的多党制政党政治只是貌似相同,其经济社会基础无疑具有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纳赛尔时代一党制的建立与萨达特时代多党制进程的启动均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官方运动而非自下而上的民间运动,政党政治皆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亦不无相似之处。纳赛尔时代的一党制政党制度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萨达特时代多党制进程的启动同样出自统治者的恩赐,而统治者的恩赐决定了民众政治参与的脆弱性和明显局限性,多党并存和一党独大则是萨达特时代后期政党政治的突出特征。萨达特多次强调法律至上的原则,声称建立法治国家。然而,萨达特时代,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政党政治和民众舆论尽管获得一定的自由空间,却依旧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多党制的初步尝试并未改变极权主义和官僚政治的国家体制,政党政治依旧具有精英政治的浓厚色彩,下层民众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

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的政党政治依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政党法和选举法对于反对派政党参与议会竞选限制颇多,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亦未完全分离。执政的民族民主党长期控制国家机器,操纵选举,在议会中处于一党独大的地位,而议会俨然是“民族民主党的分支机构”[12](p.95)。诸多反对派政党缺乏宽松的活动空间,尚未与民众政治广泛结合,加之派系林立,选票分散,难以与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分庭抗礼,亦无力统治民族民主党的政治权威。

后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处于从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阶段,其突出特征在于旧的秩序趋于崩溃而新的秩序尚未确立。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只是少数人;下层民众丧失旧秩序提供的社会保障,而尚未被纳入新秩序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遍处于孤立无助的贫困状态。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贫富差异日趋扩大,社会分化明显加剧,腐败现象蔓延。另一方面,后纳赛尔时代,埃及的人口增长率逐年上升,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剩余劳动力队伍不断扩大,形成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失业率居高不下[4](p.122)。乡村人口离开土地而涌入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处于游离状态,缺乏必要的经济保障和政治权利。青年人就业无门,前途渺茫,亦心存不满。

后纳赛尔时代,多党制的政治实践无疑呈上升的趋势。然而,诸多世俗政党的政治实践往往局限于精英阶层,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社会孤立性,难以动员下层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反对贫富不均和倡导社会平等的信仰原则在下层民众中广泛传播,成为下层民众寻求精神安慰的形式,清真寺则提供了庇护下层民众的场所。越来越多的人身着传统伊斯兰教服饰,并非发思古之幽情,意在发泄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进而挑战世俗政权的统治地位。安拉的统治取代法老的统治以及实践《古兰经》的信仰原则和重建先知时代的神权政治成为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基本纲领,伊斯兰教的政治化则是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理论武器。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伊斯兰反对派政治组织,在下层民众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蕴含着民众动员的巨大潜力。

1952年“七月革命”前夕,穆斯林兄弟会与自由军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自由军官反对法鲁克国王独裁统治的重要政治盟友。“七月革命”胜利后,穆斯林兄弟会试图挑战自由军官的统治地位,欲与自由军官分享国家权力,成为纳赛尔政权的潜在政治隐患。1954年,纳赛尔政权取缔穆斯林兄弟会,禁止穆斯林兄弟会公开活动。纳赛尔时代,穆斯林兄弟会处于非法的状态,组织体系遭到严重的破坏,穆斯林兄弟会领袖哈桑·侯代比被判终身监禁,穆斯林兄弟会的著名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则被政府处以极刑,亦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迫流亡国外。萨达特政权建立后,推行自由化政策,政治环境较纳赛尔时代相对宽松。萨达特曾经将纳赛尔时代称作唯物主

义的时代,世俗主义的原则构成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相比之下,自萨达特时代开始,埃及社会的宗教氛围日渐浓厚。爱资哈尔代表的官方伊斯兰教从属于萨达特政府,强调现存秩序的合法性,支持萨达特政府的内外政策,成为政府控制民众和驾驭社会的重要工具,萨达特本人则以“信士的总统”自居。与此同时,伊斯兰复兴运动呈明显上升的趋势,穆斯林兄弟会重新崛起,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20世纪70年代初,萨达特政权实行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穆斯林兄弟会由于与纳赛尔政权积怨甚深,支持萨达特政权的非纳赛尔化政策。萨达特政权则试图借助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遏制和削弱世俗色彩的纳赛尔主义残余势力,强化新政权的社会基础。自70年代中期开始,萨达特政权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进而分道扬镳。1977年,穆斯林兄弟会抨击萨达特出访耶路撒冷,反对与以色列单独媾和。1978年,穆斯林兄弟会谴责萨达特政府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是背叛伊斯兰教信仰和出卖阿拉伯民族利益。1979年,穆斯林兄弟会支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抗议萨达特政府向伊朗国王巴列维提供政治避难。与此同时,萨达特政权开始指责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的国中之国,进而打击穆斯林兄弟会,逮捕穆斯林兄弟会领袖欧默尔·泰勒迈萨尼,接管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清真寺,穆斯林兄弟会与萨达特政权的紧张关系骤然加剧。

穆斯林兄弟会自1928年创建以来,历经哈桑·班纳(1928-1949)、哈桑·侯代比(1949-1970)、欧默尔·泰勒迈萨尼(1970-1986)和哈米德·阿布·纳斯尔(1986-)四代总训导师。强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信仰原则、建立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和遵循伊斯兰教法,无疑是穆斯林兄弟会始终坚持的基本纲领。然而,随着所处政治环境的变化,穆斯林兄弟会的斗争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宪政时代的穆斯林兄弟会强调复兴伊斯兰教和争取埃及的民族独立,诉诸圣战和崇尚暴力构成穆斯林兄弟会区别于诸多议会政党的明显特征。纳赛尔时代,穆斯林兄弟会长期处于低谷状态;极权政治和高压政策的特定环境塑造了穆斯林兄弟会之极端主义的思想倾向。进入70年代以后,穆斯林兄弟会出现裂变趋势,形成从极端倾向到温和色彩的诸多派别。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派别伊斯兰解放组织、赎罪与迁徙组织和新圣战组织崇尚赛义德·库特卜阐述的极端主义思想,强调政治斗争的圣战暴力性,恐怖活动构成穆斯林兄弟会极端派别的显著特征。相比之下,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势力具有相对温和的政治色彩,主张放弃暴力,寻求合法的斗争方式,明确宣称“我们已经与暴力彻底决裂”,“我们不接受武装革命,不接受群众动乱”<sup>[10](p.375)</sup>。在此基础上,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致力于政党政治,积极参与议会竞选。穆斯林兄弟会的著名理论家马蒙·胡代比声称:“我不坚持立党,但是坚持进行政治活动和民众活动。如若国家实行政党制,又认为适用于我们,那么我们就是政党。”<sup>[10](p.377)</sup>穆斯林兄弟会的总训导师欧默尔·泰勒迈萨尼则明确表示:“我们进入议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主张通过议会竞选的形式角逐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目的。然而,萨达特政权沿袭纳赛尔时代的传统,坚持教俗分离的政治原则,强调“宗教中无政治,政治中无宗教”<sup>[5](p.414)</sup>。穆斯林兄弟会要求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和参与议会竞选,萨达特政权则明确否认兄弟会具有合法政党的地位,只允许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世俗政党和从事政治活动。萨达特曾经公开表示:“那些热衷于伊斯兰教的人应当到清真寺去,那些希望从事政治的人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sup>[4](p.117)</sup>

穆巴拉克时代,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激烈角逐成为埃及政党政治的突出现象。20世纪8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政府处于合作的状态。穆巴拉克政府一方面否认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合法政党的地位,另一方面允许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从事政治活动和参加议会竞选。1984年,埃及议会选举,穆斯林兄弟会与新华夫托党建立竞选联盟,获得57个议会席位,其中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获得9个议会席位。议会选举的积极参与标志着穆斯林兄弟会继自由主义时代之后再次成为具

有合法地位的反对派政治力量,议会随之成为穆斯林兄弟会角逐国家权力的重要舞台。1987年,穆斯林兄弟会主流派别修改政治纲领,删除“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道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的传统内容,“把选票投给安拉,把选票投给穆斯林兄弟会”成为穆斯林兄弟会主流派别的竞选口号<sup>[11]</sup>(p.218)。同年,穆斯林兄弟会与社会劳动党、自由社会主义党组成竞选联盟,获得60个议会席位,其中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获得38个议会席位,超过新华夫托党的35个议会席位<sup>[11]</sup>(p.218)。进入9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穆斯林兄弟会的许多成员遭到逮捕,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随之由温和反对派逐渐演变为激进反对派,进而公开指责穆巴拉克政府压制民主、执政党一党独大和缺乏公正选举,要求废除政党组织法,要求获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

#### 参考文献:

- [1]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 S. Botman, *Egypt from Independence to Revolution 1919 - 1952*,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 M. Hussein, *Class Conflict in Egypt 1945 - 1970*,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 [4] D. Hopwood, *Egypt: Politics and Society 1945 - 1984*, Boston: Derek Hopwood, 1985.
- [5] 杨灏城,江淳.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6] K. Wheelock, *Nasser's New Egyp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0.
- [7] 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M].陈和丰,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8] R. W. Baker, *Egypt's Uncertain Revolution Under Nasser and Sadat*,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9] R. A. Hinnebusch, *Egyptian Politics Under Sada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0] 杨灏城.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1] R. Springborg, *Mubarak's Egypt: Fragm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 [12] N. S. Fahmy, *The Politics of Egypt: State - Society Relatio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2.

## The Evolvement of Modern Party Politics in Egypt

Ha Quan'an

(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modern party politics in Egypt, namely the Constitutionalism Era, the Nasser Era and the post - Nasser Era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Evolvement of Egypt party politics was from the multi - party politics of the Constitutionalism Era to the single - party politics of the Nasser Era and the last to multiplication of party politics during the post - Nasser Era. At the same time,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alism parties and democratic parties, the interweavement of secular parties and religious parties, and the fierce conflicts between parliamentary parties and non - parliamentary parties, embodied the historical movements in political circles of the modernization in Egypt.

**Key Words:** Egypt; Party Politics; Wafd Party; Arab Socialist Union; The Muslim Brothers